

英国修道院图书馆及其历史影响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monastic libraries in England can be traced back to about 1000 years ago. During the Reformation in England in 1530s, Henry VIII dispersed collections in almost all monastic libraries. It was the darkest period in library history in England and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a new changing era. 18 refs.

KEY WORDS Library history. Monastic library. History of England.

CLASS NUMBER G250.9

在英国,如果不谈宗教,就难以理解英国社会,同样,如果不涉及修道院图书馆,就无法深入研究英国图书馆的历史。教会图书馆在英国图书馆的历史上独饰主角千年左右,几乎垄断了整个中世纪的图书文化阵地。可以说一部修道院图书馆的历史就几乎是一部中世纪图书馆的历史。

1 修道院图书馆的积极意义

1.1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修道院图书馆充任了英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中心

从公元6世纪末在坎特伯雷建立了英国第一座修道院起,到16世纪中期亨利八世封闭了英国几乎所有的修道院为止,英国的图书馆一直被控制在修道院中,这不仅在文化教育极其贫乏的中世纪初期是如此,即使在中世纪中后期文化教育有所发展以后,学校和图书馆依然掌握在教会与修道院手中。

公元597年,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奉罗马教皇格里高里一世(Gregory, I)派遣来英格兰传教,在坎特伯雷东边离城不远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修道院。“奥古斯汀随身带一部分书籍和一份圣·本尼迪克特(Benedictus)草拟的图书馆规则”^[1],后来教

皇格里高里又赠送了许多书籍^[2],于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图书馆便随着修道院一起被介绍了进来。60多年后,在塔苏斯和雅典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西奥多从罗马来坎特伯雷接任大主教,他带来了不少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籍,扩大了图书馆。在他的主持下,坎特伯雷成了英格兰南部的学习中心^[3]。

此后,图书馆与修道院形影相随,在很多情况下书籍成为建立修道院的首要条件。西奥多的学生本尼迪克·比斯科普(Benedict Biscop)在坎特伯雷学习后又到罗马学习。他曾五六次去罗马,每次回英时都带回很多书籍。在结束第4次旅行后,他先后于674年和681年在英格兰的北部建立了韦尔茅斯(Wearmouth)和贾罗(Jarrow)两座修道院,并都设有很好的图书馆,收藏了一些最好版本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书籍。从比德《英吉利教会史》中所举书名得知,这些图书馆的藏书不仅有宗教著作,还有世俗著作,如维吉尔(Virgil,前70~19)、贺拉斯(Horace,前65~8)等人的著作,以及《罗马法》及其他作品。无疑,这里又成为英格兰一个新的学习中心。比斯科普的学生比德(Beda或Bede)就“曾善用这两所修道院的藏书以撰述《英格兰教会史》”^[4],成为当时欧洲学术界的泰斗、英国

第一位史学家的。

同样,8世纪在约克形成的修道院又成为另一个学习中心,后来跟随查理大帝在加洛林复兴中最为出众的学者阿昆(Alcuin)早年就学于此。这里还藏有西塞罗、维吉尔等古代罗马作家的著作,并开设语法、算术和天文学的课程^[5]。

此外,在惠特此、格拉斯顿伯雷、达勒姆等地的修道院都以其图书馆为依托,而成为当地的学习中心,以致于当时流行一句俗语说:“修道院若无图书馆,就像堡垒而无四壁”^[6]。可见图书馆之于修道院的地位。

即使是征服了英格兰的诺曼公爵威廉,在繁忙的军事政治活动中,也没有忘记借助于修道院的图书馆,在这块征服了的土地上进行文化的渗透。他从诺曼底选拔许多教士担任英国教堂神父或修道院院长。这些教士比一般的盎格鲁撒克逊教士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来英格兰上任时,从大陆携带了大批的书籍,并且带来了管理和利用图书的方法。他们的到来,提高了英国教会和修道院的文化水平,沟通了英国和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系,加深了拉丁化的影响,也加强了图书馆工作的力量。他们中的杰出人物,原诺曼底贝克修道院学校校长,后被威廉任命为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弗朗克(Lanfranc),在英国图书馆史、以至文化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篇章。他对坎特伯雷修道院图书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倡导用罗马书法代替爱尔兰、撒克逊字体,亲自校勘整理基督教父的书籍,组织抄写和传播神学图书,并鼓励修士们编写传记,还制定了图书馆借书与阅读的规则。现尚存于坎特伯雷的许多意大利风格的手抄本,无疑是从他的时代保存下来的。从兰弗朗克时起到13世纪前是英国教会文化发展的颠峰,其间,许多修道院恢复或重建了图书馆,在写书、抄书和学习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世俗文化往往也基于修道院图书馆得以

发展与传播。这在托钵僧会图书馆表现得尤其突出。在英国,托钵僧会约于13世纪20年代先后出现在坎特伯雷和伦敦,此后发展迅速,到1256年时,牛津和剑桥就有49个不同的落脚点。由于托钵僧侣们严格而又贫穷的生活,读书便成了一种寄托和放松。各修道院几乎都拥有大型的、体面的图书馆。如方济各会最多的收藏是在伦敦的一个修道院,该院1422年落成,内设有28张书桌和8张双人椅,全部成本在当时不低于556英镑^[7]。与兰弗朗克所在的图书馆不同的是,托钵僧会图书馆藏书的重点,除了圣经和神学书籍外,更多的收藏科学和人文书籍。据15世纪早期一位托钵僧修士编制的一份英国图书目录记载,有195个图书馆收藏了674名作家的著作,人们把这本目录同时视作当时的文学家传记词典^[8]。可见,这些图书馆收藏远远超出了神学的范围,世俗文化同样在这里得以保存与传播。

早期的大学图书馆也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早期的大学图书馆常常与教堂紧靠在一起,或者楼下为教堂,楼上为图书馆,或者左翼是教堂,右翼是图书馆。许多主教同时也是早期大学图书馆的创始人,牛津大学总图书馆,最初就是由伍斯特的主教科汉(Thomas Cobham)开设的。达勒姆的主教、藏书家理查德·伯里(Richard de Bury)就曾为牛津大学的达勒姆学院图书馆的建设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去世时,又将自己的藏书赠给这个图书馆。再有,早期大学图书馆没有专职的馆员,一般由修道院的修士兼管藏书。

总之,在漫长的中世纪,英国的文化教育落入修道院,而修道院图书馆自然便成了社会文化教育的中心。

1.2 修道院图书馆保存了人类的文化遗产

修道院图书馆不同于古代图书馆,它很少受政权更迭的影响,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内一直得以存在。在没有印刷业的中世纪,由

于图书的增加只能靠抄写,所以很多修道士抱着对上帝的虔诚,日积月累地埋头在抄写室内进行抄写,他们在人类文化史上的这一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修道院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藏书,对图书的出借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图书的增加是靠手工抄写来完成的,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此在修道院内部借书,有的规定一年办理一次集体借书,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僧侣们都来归还前一年借走的书,然后借用当年要看的书;有的规定借出的书只能白天在书橱附近阅读,不能带走。如果因管理不善而丢失,管理人员不仅要赔偿与书价相等的费用,而且还要罚款,因此许多修道院图书馆都没有阅览室。这使其藏书的功能得到了加强。

在宗教改革对修道院图书大举破坏之时,许多宗教界的有识之士纷纷抢购了许多羊皮纸抄本和珍贵图书,如坎特伯雷大主教帕克(Matthew Parker)就是典型一例。他的相当数量的藏书现仍收藏在剑桥大学考帕克里斯蒂学院。1560年,作家贝尔曾在信函中提到帕克大主教要求他从被破坏的修道院中尽全力抢救出更多的手抄本。帕克的藏书被后人多次校勘整理,并出了目录。

1.3 修道院图书馆的另一功绩还在于这里造就了一批人才

前文提到的英国历史学之父比德是最早期修道院图书馆中有成就的著名学者。还有约克修道院的阿昆,有人说他是比德的学生^[9],他曾任约克圣堂学校校长^[10]。其学术名声已遐迩皆知。后来应查理大帝之邀赴法国时,随身带着许多图书。在那里,他以全部身心用于指导查理大帝的学习和宫廷学院的教育。796年,他当了圣马丁修道院院长,这是法兰克最为著名的修道院之一。阿昆又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杰出的图书馆及抄写室,并派人回约克把那里的图书抄来,大大丰富了圣马丁修道院的馆藏。阿昆还编写了一部供整个

法兰克国家通用的圣经读本。他为查理大帝所要达到的文化学术目标,为查理曼文化复兴运动鞠躬尽瘁,尽心尽力。他在法兰克文化教育史上的功绩,使之名扬西欧,留芳青史。

另一个是达勒姆的主教伯里,曾任英国大臣。他虽不是一个知名学者,却是那个时代最热心、最有影响的图书收藏家之一。他去世之前,写了《热爱图书》(Philobiblon)一书,书中记载了他对书籍,对阅读所表现的极大兴趣。今天人们仍在阅读它,不仅是由于它真实地记录了这位中世纪学者的内心世界,而且它也是一篇具有文学价值的珍品,同时还是一部带有中世纪色彩的图书馆理论的书。

1.4 修道院图书馆还成功地进行了早期书目工作的实践

修道院图书馆可能很早就有本馆的馆藏书单,但多馆的联合目录的产生是13世纪。这项工作主要体现在托钵僧会图书馆编制的目录上。英国的方济各会的几名修道士同心协力在1250~1296年间编制了一份《英国图书目录》(Registrum Librorum Angliae)。这是现存的最早的联合目录,它收录了183所修道院图书馆的94名作家的书籍^[11]。另有书记载该目录收集了160所修道院中85个作家的书籍^[12]。15世纪早期,圣爱德蒙兹修道院的僧侣约翰·波士顿(John Boston),可能是该修道院的图书管理员,他以《英国图书目录》为基础,编制了《教会手抄本目录》(Catalogus Scriptorum Ecclesiae),收有195所修道院中674名作家的图书,并附有作者简介,其收录的图书比《英国图书目录》大约多10倍^[13]。因其按字顺排序,这一目录在当时也被视作文学传略词典。这份目录在17世纪时有人抄写,其抄写本目前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内。

2 修道院图书馆的消极影响

修道院图书馆在图书馆发展史上虽有其

积极意义,但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

其一,小小的修道院图书馆在英国历史上绵延千年,反映出学术文化的停滞与退步。

在漫长的中世纪,英国、乃至整个西欧,只有修道院图书馆这个小小的文献中心,与古希腊、罗马的图书馆相比,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的反映。早期修道院只是尽可能使其图书馆藏书与院内僧侣人数至少保持一人一书的比例,达到这一比例以后,藏书的增长速度通常就缓慢下来。到第13世纪时,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通常只有数百卷,或不及此数^[14]。如规模较大的达勒姆修道院图书馆,在1200年时,藏书只有600卷左右。约克的奥古斯汀修道院1372年藏书目录中列出了656卷藏书^[15]。这主要是因为,在印刷术普及之前,藏书的增长主要靠手工抄写,尽管抄书人员不断地工作,但藏书的增长仍十分缓慢。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内容也主要是宗教典籍,最基本的是圣经。其次为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以及后出的注疏本、圣徒的日记、教堂礼拜用书等。再次为拉丁文教科书及文法书,少数拉丁文古典作品及当地的文学及历史著作。12世纪时起,开始有民法与教规书籍,以及科学书籍,诗歌及戏剧等进入修道院图书馆,但数量十分有限。

其二,修道院图书馆不具开放性。

由于图书的增加十分困难,已有的藏书就显得十分珍贵。图书馆一般不对外借书。有的图书还用锁链牵在书桌上,叫做“锁藏图书”(Chained Books),每一个书桌牵有十几本到几十本书不等。这种锁藏图书只能拿到书桌上阅读,根本没有外借的可能性。未上锁链的书间或也有外借或馆际互借,但借出面是很有限的。在修道院中,若将书借给陌生人,需参照许多条款,主要是以典当的方式进行,普通民众根本没有借书的机会。修道院内部出借图书也有严格的规矩,一般以本尼迪克法规48条为准。图书馆只允许每人每

年借一本书,借期结束时的还书仪式很隆重,有时修道院院长要就修士所借之书进行提问,若回答不满意,则只能原书续借一年,准备来年再回答问题,不得再借新书了。

由此可见,修道院图书馆的封闭性,在社会进步的步伐加快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时,反而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

3 修道院图书馆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

3.1 人文主义的兴起,动摇了教会统治的思想基础

从14世纪下半叶起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的思潮,虽然并不直接反对宗教,但它否认神权至上,反对盲从教会信条,动摇了罗马教会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同时,资产阶级又力求以人文主义精神教养子弟,在学校中发展了人文主义教育,打破了教会在学校中的思想垄断地位。

文艺复兴也大大推动了社会图书馆事业,反过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又推进了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教会图书馆逐渐衰落,人文主义者的私人图书馆得到了发展,不少私人图书馆后来成为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基础。这一时期,虽然书籍的生产依旧是靠抄写,但抄写工作已不局限在修道院了,而是在文化发达的大城市进行,抄写量也空前增多,还出现了专门的抄书业和书商。馆藏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各图书馆的古代经典和世俗作品大量增加,甚至连梵蒂冈图书馆也没能例外。另外在这一时期许多人文主义者主张“开放”图书馆,某些私人图书馆也逐渐向公众开放,尽管这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但同藏书楼式的修道院图书馆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3.2 科学技术的发展,驳斥了教会谬误

在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在欧洲也“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16]。

实验医学的发展,航海业的发展,天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进步,以及 15 世纪后期开始的一系列地理大发现,都极大地驳斥了基督教会谬误,否认了教会的绝对威信,动摇了千余年来基督教关于上帝创世的神学信条,无情地轰击了教会的神学堡垒。

3.3 印刷术的发明对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活字印刷术在 15 世纪末期传到英国,很快印刷图书在英国发展起来。从 1476 年英国创办第一所印刷所后,出版了许多图书和小册子,图书的复本大大增加。据对 1600 年前的印刷图书——摇篮刊本的统计数字看,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 1 万册以上的摇篮刊本中,有 200 册是英国印刷的^[17]。而至今保存在世界各地的摇篮刊本有 50 万册之多,可以推测在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英国印刷图书的出版量在万册以上。所幸亨利八世的毁书、修道院图书馆的没落是发生在印刷术发明之后,这时大多数的典籍已有印刷本传世,仅少数孤本失传,相对损失较小。

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出版的速度加快,书价大大降低,一般市民阶层也有了买书的可能,对资产阶级从教会手中夺取文化阵地有重大意义;文艺复兴初期,图书的抄写走出了修道院,扩展到大城市,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则使抄写室也逐渐地消失了,图书的管理与图书的生产完全地分隔开来,形成了两个专门的行业——图书出版业和图书馆事业;相对廉价图书的大量出版,使图书馆的藏书迅速增加,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建筑、管理等随之发生变化,锁藏图书不见了,图书馆的范围扩大了,再不能静悄悄地藏在修道院中了。

印刷术的传入给教会带来很大威胁。因此,虽然从 1501~1612 年的 100 多年间,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到教皇利奥十世都极力限制印刷书刊的出版,未经教会审查批准,任何

书籍不得出版。但封建专制的权势已大大削弱,市民阶层已在蓄积着力量,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

3.4 教会内部的腐朽衰败也是导致修道院图书馆衰亡的另一原因

14、15 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财富增多,教会的腐败也随之日盛一日。如:教皇滥发滥售赎罪券,掠夺信徒钱财;教廷随意增设神职、出卖神职;修道者不安于修道院内寂静淡泊的修炼生活,到院外尘世游荡,追逐酒色等等^[18]。教会骇人听闻的腐败,使世人对之丧失信心。这些事实都说明,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本身已经濒临崩溃了。

总之,在漫长的英国文明史中,修道院图书馆所担负的主要使命,是保存了古典时期的文化遗产。在英国,即使不是亨利八世以封闭的形式来结束修道院图书馆的历史使命的话,修道院图书馆也会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其他类型的图书馆所取代。因为,图书馆若要在社会文化事业上产生巨大影响,就必须使其藏书能尽其所用,门户必须开放,让大批学者、学生和热爱读书的人士得到馆内阅读,使书中的知识尽其可能地传播到大众中去。而在修道院图书馆之后使图书馆的功能得到较大扩展的,是继而兴起的大学图书馆。

参考文献

- 1 (美)谢拉著;张沙丽译.图书馆学引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17
- 2,3 (英)比德著;陈维振等译.英吉利教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84,227~228,230
- 4,6,12,14 (美)E. D. Johnson 著;尹定国译.西洋图书馆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96,99,101
- 5 安长春.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67
- 7 E. Edwards, Memoirs of Libraries. London, Trubner & Co., 1859, P306
- 8,11,13 E. A. Savage, Old English (下转第 53 页)

概况, 留学指南, 专题论文检索等多个方面的信息查询。

(3) 建设网站构造“虚拟馆藏”。因特网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图书馆设立自己的网站, 以求在网络上收集资源并与相关网址链接形成虚拟馆藏。如深圳图书馆网站主要栏目设有“最新消息”、“本馆简介”、“借阅服务”、“信息服务”、“书目查询”、“读者信息”、“网上资源”等 7 个栏目, 其中后 3 个为查询性质的栏目。读者可转换不同栏目, 获取信息。

(4) 组建因特网俱乐部。与数据通信局合作, 以图书馆信息服务事业发展为目标, 以信息用户需求为导向, 以经营为手段, 为网络爱好者提供交流信息、网上冲浪的网吧。

(5) 对信息用户进行因特网操作知识的培训。举办各类讲座和培训班, 让更多的用户熟悉了解和利用因特网。

2.3.2 在网络上实现图书文献的查询和借阅。在图书馆书目数据和馆藏信息联上因特网的基础上, 用户可在网上查询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和实际馆藏情况。在图书馆读者数据和借阅信息联上因特网基础上, 读者可上网完成续借、预约、预借, 使图书馆服务真正走向网络化。

2.3.3 建设地区性信息资源网络, 在区域间实现多个图书馆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采用

信用卡方式实现一卡通, 读者可在任何一家图书馆借、还图书, 实现纸质文献的通借通还的服务新模式。在图书馆资源数字化基础上, 实现信息资源馆际互享。深圳市的地区信息资源网络建设好后, 图书馆界将吸收全市银行系统一卡通业务的经验, 尝试实现全市图书馆信息资源的通借通还和网上传送, 使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实现革命化的转变。

2.3.4 建设地区性的文献网络采访合作计划。以技术力量雄厚的图书馆为中心, 以多个馆的加入构造文献集中采编的模式, 逐步形成地区性的文献数据库。以此为基础, 在深圳市的文献资源网络建成后, 可实现馆际间的合作采访, 真正做到文献资源与购书经费的合理配置, 实现资源共享, 由此形成全市文献资源建设的新格局, 以整体资源的集成和配置结构的优化来应付日益严峻的文献资源激增的挑战。

参考文献

- 1 张晓林. 走以能力为基础、服务驱动的发展之路. 图书情报工作, 1998(4)
- 2 深圳图书馆文献资源网络建设. 内部资料

王 冰 深圳市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副主任。通讯地址: 深圳市红荔路。邮编 518027。

(来稿时间: 1998-11-10。编发者: 徐苇)

(上接第 66 页)

Librarie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12, P59

9 蒋孟引. 英国史. 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8: 51

10, 17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65

15 (英) 奥尔德里奇著; 诸惠芬等译. 简明英国教育史.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136

16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 卷), 第 524 页

18 杨真. 基督教史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291

华薇娜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通讯地址: 南京市。邮编 210093, 电子信箱: huawn@jlon-line.com)

(来稿时间: 1998-07-30。编发者: 瞿凤岐)